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

# 宋代社会生活研究

汪圣铎 著

人民出版社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

# 宋代社会生活研究

汪圣铎 著

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代社会生活研究 / 汪圣铎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

ISBN 978-7-01-006742-1

I. 宋… II. 汪… III. 社会生活—研究—中国—宋代 IV.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687 号

## 宋代社会生活研究

SONGDAISHEHUI SHENGHUOYANJIU

---

作 者: 汪圣铎

责任编辑: 邵永忠

文字编辑: 范茂辉

封面设计: 胡继红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lepress.net](http://www.peo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装订: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625

字 数: 4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6742-1

定 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

河北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天津工商大学，后改称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定名为河北大学，1970年从天津迁至古城保定。河北大学的历史学科，创建于1945年天津工商学院的史地系，侯仁之院士出任首届系主任。聘请齐思和教授讲授中国通史，1946年9月至1948年先后由方豪、王华隆任系主任。1949年1月天津解放，钱君晔任系主任。1952年王仁忱出任系主任。1953年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在20世纪50—60年代，河北大学历史学科以拥有漆侠、李光壁、钱君晔、傅尚文、周庆基、乔明顺、葛鼎华等史学专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创办《历史教学》杂志而著称于世。改革开放以来，河北大学历史学科再创佳绩，获得全国第二批、河北省第一个博士点，建成河北省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挂靠于此，并负责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通讯》。2005年以来，又获得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建成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河北大学历史学科被评定为河北省强势特色学科，获得空前大的支持力度，迎来更新更好的发展机遇。在继续编印《宋史研究论丛》（CSSCI来源集刊）和《宋史研究丛书》的同时，我们决定隆重推出《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该丛书编委会成员除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外，主要有：郭东旭、刘敬忠、郑志

廷、汪圣铎、张家唐、闫孟祥、刘秋根、刘金柱、吕变庭、杨学新、雷戈、肖爱民、肖红松等先生。

研究历史，教书育人，奉献社会，是我们的天职。

不吝赐教，日新月异，臻于完善，是我们的期待。

最后，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和各位专家对本学科的长期厚爱和支持。特别鸣谢人民出版社对《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的鼎力襄助。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姜锡东 成员：王菱菱、范铁权、丁建军

## 前言

本书是作者系统研究宋代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成果。研究的重点在下列四方面：一是对精神文化生活，如宋人公私观，佛教、道教对礼法的渗透，僧人中忠于国家观念的流行及南宋时期的观音崇拜。二是对官员、宗室这两个特殊群体生活状况的考察，以及对宋代特有的妇女享受俸禄这一社会现象的考察。三是对社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等的分析，包括对医官系统的存在状况及对瘟疫的防范，对童子举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其中还有对《神童诗》作者的考察。四是对社会经济生活某些侧面的考察，包括官府经商、财政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交通设施，物价变化，伪钞、有价证券、金银钱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

本人对宋代社会生活的研究，虽力求系统、全面，但鉴于有些方面前人的研究成果已多，难以超越，本人在经过努力后仍未能取得显著成果，所以，眼下献给读者的成果仍是不够系统、全面的，这是令人遗憾的。另外，还必须在这里说明，这些成果中，有少数课题是本人与比自己年轻的学者（包括我的学生）

本书的重点是实事求是地细致分析考察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实际状况，寓论于史，力求以此推动近年来对宋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 目 录

|                 |             |
|-----------------|-------------|
| 405             | 直谷内已故爵爵升宋   |
| 414             | 岳生会封升宋已墨    |
| 432             | 晏回南豫官升宋     |
| 454             | 甄武符登品商已封柳升宋 |
| 484             | 醉武随升宋       |
| 494             | 宋得封出位爵宋南北   |
| 512             | 照普角随随王宋     |
|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 | 1           |
| 前 言             | 1           |
| 222             | 51 51       |
| 宋儒的公私观          | 1           |
| 宋朝礼与佛教          | 19          |
| 宋朝礼与道教          | 35          |
| 僧人抗金事迹与僧人的忠孝观   | 50          |
| 南宋王朝与观音崇拜       | 63          |
| 宋朝宗室制度研究        | 87          |
| 宋代祠禄制度研究        | 141         |
| 宋朝文官俸禄与差遣       | 158         |
| 宋代官员俸禄和其他颁给分项考析 | 173         |
| 宋朝卖官鬻爵辨析        | 210         |
| 宋代女性享受俸禄研究      | 252         |
| 宋朝医官与防范瘟疫       | 267         |
| 宋代火政研究          | 295         |
| 宋代种花、赏花、簪花与鲜花生意 | 331         |
| 宋代的童子举及《神童诗》    | 355         |
| 南宋学生参政析论        | 381         |

|                  |     |
|------------------|-----|
| 宋代滑稽戏与钩容直·····   | 402 |
| 墨与宋代社会生活·····    | 417 |
| 宋代官府的回易·····     | 435 |
| 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 | 457 |
| 宋代的递铺·····       | 484 |
| 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   | 496 |
| 宋王朝的物价管理·····    | 515 |
| 宋代货币与社会生活·····   | 537 |

|          |     |
|----------|-----|
| 后 记····· | 555 |
|----------|-----|

|     |       |
|-----|-------|
| 1   | 宋徽宗公卿 |
| 11  | 宋徽宗已故 |
| 23  | 宋徽宗已故 |
| 30  | 宋徽宗已故 |
| 33  | 宋徽宗已故 |
| 38  | 宋徽宗已故 |
| 41  | 宋徽宗已故 |
| 42  | 宋徽宗已故 |
| 43  | 宋徽宗已故 |
| 44  | 宋徽宗已故 |
| 45  | 宋徽宗已故 |
| 46  | 宋徽宗已故 |
| 47  | 宋徽宗已故 |
| 48  | 宋徽宗已故 |
| 49  | 宋徽宗已故 |
| 50  | 宋徽宗已故 |
| 51  | 宋徽宗已故 |
| 52  | 宋徽宗已故 |
| 53  | 宋徽宗已故 |
| 54  | 宋徽宗已故 |
| 55  | 宋徽宗已故 |
| 56  | 宋徽宗已故 |
| 57  | 宋徽宗已故 |
| 58  | 宋徽宗已故 |
| 59  | 宋徽宗已故 |
| 60  | 宋徽宗已故 |
| 61  | 宋徽宗已故 |
| 62  | 宋徽宗已故 |
| 63  | 宋徽宗已故 |
| 64  | 宋徽宗已故 |
| 65  | 宋徽宗已故 |
| 66  | 宋徽宗已故 |
| 67  | 宋徽宗已故 |
| 68  | 宋徽宗已故 |
| 69  | 宋徽宗已故 |
| 70  | 宋徽宗已故 |
| 71  | 宋徽宗已故 |
| 72  | 宋徽宗已故 |
| 73  | 宋徽宗已故 |
| 74  | 宋徽宗已故 |
| 75  | 宋徽宗已故 |
| 76  | 宋徽宗已故 |
| 77  | 宋徽宗已故 |
| 78  | 宋徽宗已故 |
| 79  | 宋徽宗已故 |
| 80  | 宋徽宗已故 |
| 81  | 宋徽宗已故 |
| 82  | 宋徽宗已故 |
| 83  | 宋徽宗已故 |
| 84  | 宋徽宗已故 |
| 85  | 宋徽宗已故 |
| 86  | 宋徽宗已故 |
| 87  | 宋徽宗已故 |
| 88  | 宋徽宗已故 |
| 89  | 宋徽宗已故 |
| 90  | 宋徽宗已故 |
| 91  | 宋徽宗已故 |
| 92  | 宋徽宗已故 |
| 93  | 宋徽宗已故 |
| 94  | 宋徽宗已故 |
| 95  | 宋徽宗已故 |
| 96  | 宋徽宗已故 |
| 97  | 宋徽宗已故 |
| 98  | 宋徽宗已故 |
| 99  | 宋徽宗已故 |
| 100 | 宋徽宗已故 |

# 宋儒的公私观

## 宋儒的公私观

公私对立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古代起源很早。《周书·周官》记载，周成王曾训诫公卿们，要求他们应“以公灭私”。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把“天下为公”作为一种理想境界。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作之一的《韩非子》一书中，讨论或涉及公私问题者多达数百处。其中《五蠹》还记载：“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如所记属实，古代关于公私问题讨论的历史起点或许还可前移，秦以后的各朝各代，关于公私问题的讨论时时见诸史册。如汉代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讲过“统体之道在乎至公无私”的话。魏晋时名士嵇康撰《释私论》讨论公私问题。《贞观政要》卷八载唐太宗曾讲：“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但是，同历朝历代相比，宋代人对公私问题的讨论要更频繁、更深入，似有必要专作一析论。

### 一、宋代国家管理方面关于公私的议论

在宋代政治生活中，关于公私问题的议论颇为经常化，其中最突出者，是包含有“公天下”理念的议论。

所谓“公天下”，大抵是先秦儒家“天下为公”论的延伸，

但却因时代改变而产生了具体含义的变化。《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论，是把“公天下”与“家天下”加以对立的，同时认为“公天下”优于“家天下”，这种理念对于把“天下”视同自家私产的那些统治者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在《韩非子》那里，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公”与“国家”划了等号，君主也就成了“公”的化身。凡是为国效劳、为君主效力，都是为公，凡是违背国家利益、君主利益的行为，都被纳入“为私”的范围。后代儒家学者，大抵吸收或部分吸收了《韩非子》中关于“公”的认识，力图把古人两种不同的公私理念融为一体。

宋初以来，国家政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那就是中央集权制和君权的前所未有的加强。这导致国家命运与更多人的命运更紧密、更直接地联系，人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程度前所未有的提高，人们对君主行为的关注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于是“公天下”的问题也就受到前所未有的关心，其内涵也就充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

宋仁宗时，著名学者石介对宰相提出要求说：“夫庙堂之上，举制度，出教化，施诰命，行赏罚，进百官，退百官，宰相之任也。一言得失系四海之安危，一令臧否系社稷之休戚，举制度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举出，一教化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出施，一诰命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施行，一赏罚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行，况进百官退百官耶。合天下之大公也，虽其亲昵，人不谓之私。用一人之私也，虽曰疏远，人不谓之公。令其子弟苟有如稷契皋陶，曰吾避嫌不敢举，岂公天下之心乎。是私己而忘国家、顾一身而遗四海也。”<sup>①</sup>宋仁宗在位后期，年轻气盛的苏辙在应考对策要求君主“守法”，并讲：“夫为天下国家惟刚者能守

其法，而公者能以刚服天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sup>②</sup>苏辙这里是针对君主讲的，暗含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之意，这是很大胆的。

宋英宗时，时任谏官的司马光提出“治国莫先于公”的命题。<sup>③</sup>把“公”提到了治国之首要原则的地位。

宋以前，人们颇有言及“至公无私”、“以公灭私”的，宋人使用这两个词的频率也很高，而“大公无私”这个新词却是宋人新造的，而这个词也被用来约束君主。程颐提出：“圣人以太公无私治天下”。<sup>④</sup>

北宋末年，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危机，人们对“公天下”的呼吁就更加强烈，靖康年间，时任御史中丞的许翰上奏说：“臣闻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他特别批评了宋徽宗独断专行，不与臣下共议就以“御笔”的形式乱下命令的做法。<sup>⑤</sup>有官员要求惩处蔡京的长子蔡攸，上言讲：“臣闻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刑赏之行非出人主私意，与天下为公而已。”<sup>⑥</sup>他们都要求君主摒弃己私，秉公处理国事。

由于“公天下”的呼声高，南宋初年刚刚得到皇位的宋高宗，为迎合舆论，也不得不心不由衷地讲：“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sup>⑦</sup>

正是在这种上上下下“公天下”的一致呼声里，南宋前期一位官阶并不高的官员方庭实，在力主抗战反对投降时讲出了如下颇有震撼力的话：“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sup>⑧</sup>这句话是对家天下、视天下为君主私产的观念的有力否定。在他之后，当宋高宗想将占地九百六十顷的永丰圩赏赐给大将韩世忠时，御史中丞廖刚就站出来反

对说：“江东圩田不知能几千顷，若诸将人赐千顷所余亦无几矣。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人主亦不得而私有之，故爵赏、赐予必有以合天下之心、厌天下之公议。”<sup>⑨</sup>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大儒朱熹把“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这句话写入了《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中，被他的弟子们广泛征引，从而使“公天下”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流传广远。到南宋理宗时，随着理学地位的提高，“公天下”的理念也就被更多的人接受，成为朝野上下经常议论的话题。如官员袁甫就曾上奏理宗讲：“臣愿陛下澄心定志深思痛省，今日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立政当以天下而立，用人当以天下而用，行至公无私之大道，全保护宰相之大体，率励群工，大明黜陟，变委靡衰弱之陋习，为涤荡振刷之宏规，断自圣意，洒然与天下更新。”<sup>⑩</sup>而给理宗担任侍读的徐元杰曾在讲课时规劝理宗道：“臣愿陛下继今以往须以天之心为心，只是至公无私，然却要与大臣参订公论，不可信左右之言……又要常体至公无私之道，把握教定。”对于这种类似说教的宣讲，理宗只好答以“极是极是”。<sup>⑪</sup>

总之，自北宋中期以后，“公天下”的理念越来越受重视，越来越得到称扬，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 二、人材任用、执法与公私观

除了泛言君主管理国家要本着“公天下”的原则外，宋人又在人材任用、执法二个方面较多地论及公私问题。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与近臣论及科举事，他提到此年人们对科举的批评少于往年，表示满意。宰相王旦就说，这是因为制度健全了，官员们照制度行事，“至公无私，其

实由此。”<sup>⑫</sup>认为好的制度是秉公录取的保证。大约宋仁宗时，官员沈遘论及科举，他说：眼下的科举是“以雕篆之弊法，考无用之空文”弊病很多，“此盖当时建议者务为苛细，以希一时，固不及知天下之大公，国家之远体矣。”<sup>⑬</sup>他认为应该允许考官面试考生，并了解考生的品行，全面考察考生的德与材，同时建立监督考官的制度，“如有背公徇私去留不允者，并许论告，即行推劾，论罪如律。”<sup>⑭</sup>“又以示天下之大公，明国家之远体，以为后世之法。”<sup>⑮</sup>明确地把科举录取同公私问题联系在一起。前述宋英宗时司马光提倡“治国莫先于公”，也重点言及人材问题。他较早地注意到《左传·昭公五年》引录的受到孔子称赞的贤人周任讲的话：“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他进而讲：“凡人君之要道，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而已。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罚者，天下之刑罚，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盖天下之公议也。今以四海之广，百官之众，有贤有愚，有善有恶，比肩接迹，杂沓并进。臣愿陛下少留聪明，详择其间，苟有才德高茂合于人望者进之。虽宿昔怨仇勿弃也。有器识庸下无补于时者退之，虽亲昵姻娅勿取也。有励行立功为世所推者赏之，虽意之所憎勿废也。有怀奸犯禁为众所疾者罚之，虽意之所爱勿赦也。如此则野无遗贤，朝无旷官，为善者劝，为恶者惧，上下悦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sup>⑯</sup>他相当细致地分析了在人材任用上乘公弃私的必要性。宋孝宗是南宋皇帝中较有作为的一位。但他有一个大毛病，即信用佞幸。当他罢免了佞幸龙大渊后，大臣王十朋曾称赞他“屈己从谏，以天下为公，不私潜邸之臣”，并要求他将龙大渊的“门下士”林安宅一并罢免。<sup>⑰</sup>大儒朱熹也强调说：“人才用舍

最系人心向背，若能以公灭私，好恶从众，则用舍当于人心矣。”<sup>⑥</sup>即也讲了人材任用上要以公灭私。他还针对君主说：“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将一切私底意尽屏去，所用之人非贤，即别搜求正人用之。”<sup>⑦</sup>明确要求君主在用人上要摒除私心。陆九渊的大弟子袁燮也借讲《尚书》的机会提出：“用人焉，必采之公论所与，则其人之贤可知矣。然后从而用之，此其与天下为公之意，安得一毫私意介乎其间。”<sup>⑧</sup>

宋人另一议论公私问题较多的场合是在公平执法方面。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后，朝廷的管理负担过于沉重，为了减轻朝廷的管理负担，同时为了防范各级官员作弊，就颁布了很多法规。然而在封建社会，君主的私利与社会的公利常常发生矛盾，因而导致皇权与这些法规常常发生矛盾，于是公私问题就于此凸显出来。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宋哲宗时期处理几位近臣及其亲属犯罪的过程中。

元祐五年（1090），资政殿学士、前知青州王安礼被揭露有违法行为。朝廷决定将他平调别处继续任职，引起不少人的不满。于是次年正月他遭到数名台谏官弹劾，其中就有二位言及应秉公执法。右正言刘唐老讲到：“法与天下公共，王者尤不得私，况臣下乎？”左司谏杨康国则讲及：“大公无私如天地，是法岂可以不行也，奈何为一安礼而特屈陛下之法哉。伏望陛下深加省察，早降指挥，正安礼之罪，褫夺职名，使自循省，以诫天下不法之吏，则陛下之法行矣。臣今区区之言，不为安礼一身，正为陛下至公之法耳。”<sup>⑨</sup>接着，又发生了翰林学士兼侍读赵彦若包庇儿子犯罪事。赵彦若又遭到众多台谏官的弹劾，其中也颇有言及公私问题的。如右正言姚勔讲到：“法者，天下之公共，非一人法也”。侍御史贾易则说：“臣闻赏善罚恶，帝王之操柄，

天下所赖以治也。惟大公无私，故能服人心，信天下，有如高下重轻一失其平，则人主威令有所不得行，积而不已至于失天下之心……”他要求惩处赵彦若，以“宣扬二圣（指太后与哲宗）大公无私之盛德”，“以示天下至公无私之政”。<sup>②</sup>贾氏于一篇奏疏中竟三次讲公私问题对于执法的重要意义，充分显示出时人对此事的重视。

北宋人的此种观念自然也影响到南宋。南宋高宗有一段时间里违反制度任用外戚，侍读卫肤敏就上奏劝谏说：“臣闻人主之政，公与私不并行，恩与法不两立，以公灭私，以法夺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挠法者乱……”，<sup>③</sup>迫使宋高宗收回成命。宋孝宗在一次不能公正执法遭到大臣反对后感叹道：“人有一点私心，法便不可行。”<sup>④</sup>南宋人余允文撰《尊孟辩》，在为《孟子》作辩解时 also 言及：“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皋陶守法者也……舜之父杀人……执之者士之职所当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废天下之公法也……盖以法者，先王之制，与天下公共为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为一人而私之。”<sup>⑤</sup>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执法必须公正，必须摒除私心，这在当时已成为相当多的士大夫的共识。

### 三、天理与人心的对立与公私观

宋学被称为义理之学，而所谓“义理”，说到底，其核心就是《大学》中的一句话，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起点就是修身，而“修身”实际上讲的是改变人的精神世界，用宋人的话说，就是“治心”。因而，治心的学说是宋学的最。较早地将治心同公私联系的

似是思想家李觏，他说：“嗟乎！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也，循公而灭私，是五尺竖子咸知之也，然而鲜能者，道不胜乎欲也。”<sup>②</sup>司马光在论述“治国莫先于公”时，也讲到治心，他说：“《大学》曰：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sup>③</sup>程颐更加强调治心对于治国的重要，他说：“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sup>④</sup>理学家讲究《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谓“十六字诀”，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们在阐释这十六字时，将人心同道心加以对立，又进而将人心同私相联系、将道心同公联系，即将人心道心的对立同公与私的对立联系在一起。如程颐讲：“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sup>⑤</sup>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讲的。朱熹进而阐述说：“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间而已。舜禹相传，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正谓此也。”<sup>⑥</sup>朱熹在这里将天理与公心（道心）联系在一起，将人欲（人心）同私心联系在一起，进而提出君主在处理公私问题上的一念之差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存亡。因而，理学又试将

理学把治心置于首位，如何治心即修养就是其学说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理学大师朱熹在讲如何治心、如何修养时，就常常与关于公私问题的讨论结合在一起。例如，他曾讲：“天理有未纯，是以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尽，是以除恶常不能去其